

三姐妹参加台胞代表大会

我父亲陈文仓出生在台湾省彰化县。1947年从台湾来到大陆,加入了刘邓第二野战军,参加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后,随部队移师福州,在那里他遇到了我的母亲,他们相识相爱并结婚。1973年,父亲所在的部队调往山西省晋中军分区,我们全家也随父亲来到山西。

1983年,大姐陈涵、二姐陈榕和我们都收到了山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备组的通知,邀请我们三姐妹一同参加山西省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大会。当时,大姐还在父亲的老部队服役,24岁。二姐和我都在山西锦纶厂上班,她22岁,是弹力丝车间的挡车工。我是帘织布车间的

挡车工,那年只有19岁。

5月24日是参会代表报到的日子,宾馆的大厅里回响着家乡的民歌,台胞们的乡音不断,倍感亲切。当时,山西全省各地的台胞一共有60多户,100多人,参加此次会议的有79名代表。我们三姐妹都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社会活动,既兴奋又拘谨。大会安排代表们住进了古树成荫、环境幽雅、古色古香的晋祠宾馆,让我们异常兴奋。会议期间,不断有省领导来看望慰问,我们的房间里笑声不断,大家都感到特别温暖。



三姐妹在投票箱前郑重投票

几天的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。5月27日,大会通过了山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章程。5月28日,会议通过了全体代表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。大会投票选举山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那天,我们姐妹仨一起随着代表们走向投票箱,满怀感谢党感谢各级领导的心情,投下了信任的一

票。此时,摄影师抓住我们姐妹三人投票的一瞬,拍下了这张非常珍贵的照片。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这张照片还被收在了大会纪念册里,成为了永远的纪念。照片中,身穿军装正在投票的是大姐陈涵,挨着大姐的是我,挨着我的是二姐陈榕。因为我小,又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而重大的活动,开会期间,我一直紧跟着两个姐姐,投票时,都被两个姐姐护在了中间。

40多年来,我们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,飞速发展。在我们心中,始终都坚定地相信两岸一定会统一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。(口述/山西晋中 陈晋 整理/李砚明)

投稿见报涨工资

40年前,我是工厂里的一名计量检定员,在全省业务考试中拿了第一名,而且自己摸索出一些技术上的创新。我想让同行们分享自己的经验,就试着往报纸投了稿子。出乎意料,三篇投稿百发百中,只是稿费有些羞于启齿。父亲说:“这不重要,我当年还得过两元的稿费呢。文章的意义才重要。”老公还有些嫉妒,戏弄我似的对儿子说:“以后咱家有了副业,生活质量要提高了啊。”

不久,单位调整工资,只有40%的名额。我没有想到,自己因“有突出贡献”列入名单,毫无悬念地晋升一级工资。我庆幸自己的努力,也庆幸发表了几篇稿子就让人们对我刮目相看。(河北唐山 张琪 72岁)

第一次领工资

给奶奶的钱有些少

我17岁参加工作,暂住在离上班地方近的奶奶家。我第一个月工资,领了20元6角。我从小养成什么事情都得母亲准许的习惯,因此,如数把工资交给母亲。母亲让我给奶奶5元钱,又给了我3元零花钱(包括早餐钱)。奶奶是一位善良的老人,没有工作收入,靠叔叔、姑姑给钱过活。当时,我感觉给奶奶的钱有些少,心里非常愧疚,心想以后一定要报答奶奶。

结婚后,我自己能做主了,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给奶奶买了一块上好布料。奶奶非常开心,逢人就夸。后来,我常给她老人家买些衣服和食物,圆了多年来想要报答她的心愿。(山西太原 葛莉琦 67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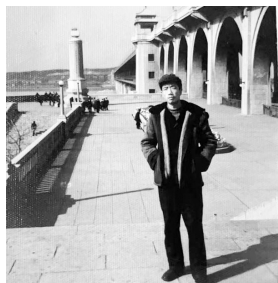
征稿

春节将至,关于往昔过年的温馨记忆,您还记得哪些?当年版欢迎扫描小程序码投稿,有老照片更好。



锣鼓声声,喜报登门

站上长江第一桥



1957年10月15日,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。1966年12月,父亲坐上从山东开往湖北的火车。父亲在山东兖州煤机厂工作,这次出差去武汉考察模具设备。这是他第一次来武汉,为了心目中的万里长江第一桥,不顾旅途劳顿,一下火车就直奔长江边。想象过无数次大桥矗立眼前,雄伟壮观,父亲在感慨之余在桥边拍下这张照片。南北温差大,父亲拍照时穿着棉衣,解开了扣子。拍照时,他特意嘱咐摄影师,一定把镌刻有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的长江大桥纪念碑取在景内。

后来,出差任务完成,父亲又一次来到武汉长江大桥,兴致勃勃地在桥上走个来回,还在桥上观赏了不远处的黄鹤楼。(山东济宁 付超 55岁)

1963年,在海军服役的二哥立了功。立功喜报从部队寄到县政府,再转至街道办事处。街道领导格外重视,组织了七八名干部和街坊,一行人列队整齐,手捧喜报,敲锣打鼓,热热闹闹地朝我们家走来。咚咚锵锵,锣鼓声声,引得路人驻足观望。

那天,我们一早接到通知,家中顿时忙作一团:扫地抹桌,整理房间,烧水备茶……父母换上过年才舍得穿的衣裳,在镜前理了又理。我们几个读中小学的弟妹,一次次跑到巷子口张望,盼着报喜队伍早点来到。“咚咚咚咚,咣咣……”锣鼓声由远及近,报喜队伍从大街拐进了巷口。打头的是一位50多岁的大妈,手捧大红喜报。



知青频道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到晋西北山村插队。村里成年人中只有村学校老师和村会计识字,我来后便成了第三个。

那个年代,村民与外界联系主要靠书信。以前,都是老师和会计为村民代写信。我来后,成为村里第三位“捉刀者”。一开始,找我给他们读信和



汪恩久(后右一)和哥哥、姐姐合影,穿军装者是二哥

我们一窝蜂奔回家禀报:“来了!来了!进巷子了!”父母闻讯,忙再次整理衣服,抖擞精神,敞开大门,并肩站在门口迎接。锣鼓声停在门外,人群涌进屋里屋外。街坊邻居纷纷挤到立功喜报跟前,争相观看。在客厅,街道干部满脸笑容,双手郑重地将喜报递到父母手中,说着祝贺和勉励的话。父母接过喜报,结结巴巴挤出几句“获奖感言”。

人群散去,平日沉默

寡言的父亲把我们叫到跟前,一本正经道:“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学习解放军,学习雷锋,咱们家,你二哥就是你们的榜样!不要一天到晚只顾着玩,要好好念书,将来也像二哥一样,挣张喜报挂墙上,才算有出息!”几天后,我们买来玻璃镜框,小心翼翼地将喜报挂在父母卧室的正墙上。父亲的叮嘱,连同二哥立功喜讯,成为我们兄妹成长进步的原动力。(江苏南京 汪恩久 78岁)

一手仿宋体,塬上有口碑

写信的村民没有几个,待他们发现我写着一手很工整的仿宋体时,开始对我刮目相看。很快,各村口口相传,一些外村村民为了让服役的孩子好好学文化,特意跑来让我写信做示范,让孩子练字。

我之所以会写仿宋体,是在学校时出校报钢板刻练出来的。到了山

村,除了农田劳作,没有其他什么事。对来找我代写信的村民,我有求必应,赚了个好人缘。县电影队在塬上放映电影,也来找我刻幻灯片。公社一级没有打字机,有时候向上级打报告,也找我去誊抄。随着“捉刀”范围不断拓展,4年后,我在文化部门找到工作。(上海 王仰 71岁)